

我每天早上起床后,第一件事就是泡一杯茶。当往杯子里倒开水时,开始声音蛮大,茶杯里的水越满,则声音越小。人也一样,本事越大,能力越强的人,往往声音越小。这让人顿生感悟。

庄子讲过一个寓言,说一只猴子,在吴王面前炫耀自己灵活的身手。它在树上腾空跳跃,左躲右闪,仿佛在挑逗吴王:你射我呀,你射我呀。结果吴王让随从一起射箭,将猴子从树上射了下来。人类有时并不比猴子聪明。现实中,那些没有功夫或只学到一点皮毛功夫的人,在对垒过程中,往往也是大吼几声:来啊,来啊!摆出一副气势汹汹的架势。其实这种人是没有什么真功夫的“假把式”,用得上一句俗话:爱叫的狗不会咬人,只是装腔作势罢了,就好像人走夜路吹口哨,无非给自己壮胆而已。

历史上的祢衡就是一个恃才傲物、目空一切的人物。有一次,曹操大宴宾客,命祢衡为鼓吏,就是击鼓为大家助兴,借此羞辱祢衡。祢衡脱得一丝不挂站在曹操面前,破口痛骂。曹操愤怒不已,很想杀掉祢衡,但又怕天下人非议,于是把他送给荆州刘表。祢衡到了荆州,旧习不改,又与刘表搞得很僵。刘表又把祢衡给了黄祖。黄祖可不是个吃素的,一气之下将祢衡砍了脑壳。祢衡时年26岁,可惜啊!这是锋芒毕露的悲剧。

陈继儒《小窗幽记》曰:

“真廉无廉名。”西晋的胡质、胡威父子同在朝中为官,都十分清廉。有一次,晋武帝问胡威:大家都说你们父子二人清廉,那到底谁更清廉呢?胡威说:我远不及我的父亲。晋武帝笑笑说:你这么说有什么理由吗?胡威答道:我清廉,担心别人不知道,而我父亲清廉,却生怕别人知道,这就是我远远不及我父亲的地方。有道是:真人不露相,蛟龙藏深海。历史上,嵇康锋芒毕露,“非汤武而薄周孔”,惨遭司马氏集团杀害;阮籍敛藏锋芒,“口不藏否人物”,而保全性命。孔子观于鲁桓公庙,见一特别之物,名曰欹器。其静止不动时呈倾斜之状,水至一半,恰器正端平,而满则立覆,滴水皆无。“满盈者,不损何为?慎之!慎之!”物极必反。梁实秋先生说,小声说话是文明……文明程度愈高,说话愈不以声大见长。此乃高见。

品茗谈文

蒙田谈读书

路来森

蒙田,是十六世纪法国著名的哲学家,他的学识之渊博,充分体现在他的《蒙田随笔》一书中。三十六岁的蒙田,就选择了退休。退休后的蒙田在自己城堡角落的两座塔楼之中,挑了一座,作为自己的书房,另一座,则留给自己的妻子。他称自己的书房为“店铺后面的小房间”,他说:“对我来说,一个人在家里完全没有属于自己的空间,没有不需要看别人脸色的地方,没有可藏身之处,是很可怜的!”在这里,书房似乎象征了一份自由。后来,蒙田又称呼自己的书房为“后客厅”,他说:“应该给自己保留一个后客厅,由自己支配,建立起我们真正自由清静的隐居地。”由此,也引申出书房的重要意义:“(在那里)我们的心灵能屈能伸;它可以自我作伴;它可以进,可以退,可以收,可以放。”在蒙田看来,读书人,有一间书房,是必要的。

蒙田说:“不止一次,我拿起一部书,满以为是我还未曾阅读过的新版书,其实,几年以前已经仔细阅读过,还写满了注释和心得。”此段文字,道出了蒙田阅读时,随时在书上做“评注”的好习惯。寻常人读书,只是习惯于“勾勾画画”,或者记一点儿笔记,但仅仅如此,还是不够的。“勾勾画画”,难免水过地皮湿;记笔记虽好,可时间长了,也容易与所阅读的书本内容相脱离,因之,在书上随手写下“注释和心得”,就大有必要了。如此,既增强了对阅读内容的记忆,又因“旁征博引,深入思考”,拓展、深化了自己的阅读内容。

其实,在书上随手“写满了注释和心得”,在中国古代,读书人早已践行之,此之为“题记”或者“题跋”是也。今人,亦多有践行之者,例如黄裳、孙犁、谷林等人。中国人还喜欢将此类文字结集成书,如《山谷题跋》《东坡题跋》《快雨

堂题跋》《文待诏题跋》等等;今人,如孙犁的《书衣文录》、谷林的《书边杂写》等。

蒙田说:“有些学问枯燥无味,艰深费解,大多数是迫于生计而勉为其难,这就让那些还在为尘世效力的人去做吧。至于我,只喜欢那些有趣易懂的作品,让我精神舒畅,不然,就是那些读了感到宽慰和劝导我如何处理生死大事的作品。”此一段文字,告诉我们:读书,要有所选择,选择最适合于自己“兴趣”的书;太难的,不必硬读。有些书,专业性太强,那就让那些专业人士去读吧。寻常之人,阅读,最好是凭了自己的“兴趣”去读——最适合于自己的书,才是最好的书。蒙田又说:“读书是愉快的事,但是读得太多,最终会让我们失去最为重要的乐趣和健康,那就把书放下。”什么事情,都要有个“度”,读书,亦是如此。虽然你很喜欢读书,但也不要过分“沉溺”,以致于影响了自己的身体健康。

读过《蒙田随笔》的人都知道,该书引用了大量资料,这就难免有“文抄公”之嫌,同时,又涉及到“读与用”的关系问题。对此,蒙田有着自己明确的理解。他说:“有时,由于拙于辞令,有时由于思路不清,我无法表达适当意思时就援引了其他人的话,我对引证不以数计,而以质胜。”可以看出,蒙田的“引”,是为“表达”而“引”;然则,这里面,“以质胜”三个字,最是要紧,道出了蒙田对于“引用”的质量要求,只要引用材料质量好,多,亦不是不可。而关于“引用”,蒙田还有更得要领的一句话,他说:“我引用别人,是为为更好表达自己。”其意甚明,“为我所用”,才是“引”之“本”所在。

读书,要有所用。蒙田在一定程度上,就教给了我们:如何“用”好所读之书了。

载得民情过洞庭

张东吾

“洞庭湖,几千里,宝庆长沙镜中裹。二月芳洲生白芷,太守过来弄此水。湖水清,清若此,湖南之民渴将死。”明代诗人庄昶诗中提到的这位“湖南之民”渴慕的清廉太守就是明成化年间的宝庆知府谢省。

谢省(1420—1493),字世修,浙江台州(今温岭)人,明景泰五年(1454)中进士,成化五年(1469)授宝庆知府。在任期间,谢省大力革新弊政,振兴教育,体贴民生,移风易俗,政绩卓著,而且倡廉守廉、行廉兴廉,以清廉有为、洁身自好的风范,涵养出一方政治生态的绿水青山。可谓为官一任,造福一方。

谢省就任宝庆知府后,发布了《谕郡邑僚属文》,文中说:“七尺之躯,一日之享,米不过一升,肉不过一豆,酒不过一瓢,冬不过一裘,夏不过一葛”,警告僚属们千万不要做贪墨贼民的“倚门之妖”“负隅之虎”“驱羊之狼”,而是要“以诚存心、以廉律己、以俭制用、以公照物、以恕待人、以勤励事、以敬事上、以严肃下、以和睦僚、以仁恤民、以宽容众”。在《宝庆府进士题名记》中,谢省则告诫宝庆士子们要做洁己不污的廉臣、守职不回的直臣、忧国忘家的忠臣、泛应曲当的能臣,千万不要做阴回险贼的奸臣、逢迎容悦的佞臣、贪婪昏墨的贪臣和残忍害物的酷臣。

谢省绝不只是把廉政挂在口头上,他不仅是这样说的,而且也是这样做的。

的大学士李东阳在《宝庆府知府谢公墓表》中记载,谢省上任宝庆府知府后,便率先垂范,厉行廉政勤政之风,将原本属于知府个人的伙食津贴改为公用,并经常访察民间疾苦,严格考核官吏,罢黜了两名有贪污劣迹的知县,将从他们身上没收的赃款抵作税款,大大地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。

在明代余杰、刘轩修撰的《新化县志》中,记载了谢省的另一则故事。宝庆府所辖的新化县是一个穷县,当时教育很不发达,县学卑湿简陋,破烂不堪,经常几十年都不能出一个进士。谢省考察县学后,决心予以改建。可是宝庆府当时正在复修府学,而新化县又穷得叮当响,怎么办呢?这时湖南提刑按察司刚好查处了一件大案,没收了200两黄金的赃款。谢省知道后,亲自出面协调弄到了这笔款子,并派员督工改建,很快使新化县学焕然一新。

诗文大家、文献巨子邓显鹤也记载了谢省的一件廉政事迹。说的是谢省辞官时,因囊中羞涩,只得乘坐官船回乡,到家后他立即斥卖官船,将卖船的银钱封存,全部移交给国库。而乾隆版《邵阳县志》记载更为详细,说谢省辞官回乡时“行李萧然”“卖舟得三十金封还府库”。可见邓显鹤的记载是有所根据的。与之相印证的是,谢省辞官回乡时曾经写过一首诗《发郡中偶成》,其中两句“小舟荡漾空无

物,载得民情过洞庭”,道出了正是他两袖清风、一尘不染的心迹和情怀。

值得一提的是,谢省工于诗文,与其侄儿谢铎(曾随宦邵阳)都是当时的诗文大家,与明代大学士、茶陵诗派领袖李东阳多有唱和。谢省对邵阳山水多有吟咏,为宝庆八景中的“六岭春色”“山寺晓钟”“洛阳仙洞”“南湖雪霁”等留下过诗文。遗憾的是,浙江温州近年出版的《谢省集》中对他在邵阳任职期间的诗文收录不多。

谢省在邵阳任职期间,曾作《劝民十诗》,劝戒郡民勿违逆父兄、勿姑息子弟、勿作乐娱乐、勿留女过老、勿轻至讼庭、勿骄惰废业、勿久停尸榭、勿逃避徭役、勿招隐流亡、勿侵占田产,不仅使当时的邵阳风气一新,也大大提升了谢省的民望,“时推循良第一”。但他仍然自觉不够称职,先是上疏请求改任教职,后来又毅然辞官。李东阳称赞他“五马岂不贵,弃之一羽轻”。这与那些稍微干了一些政绩便沾沾自喜、得意忘形的人,与那些尸位素餐、贪权恋栈之人实不可同日而语。

政声人去后,民意闲谈中。谢省离任后,邵阳人民“为专祠祀之”,在城区为他修建了去思碑,在濂溪书院内为他修建了纪念祠,而历代《宝庆府志》则将他列入了名宦传。

(张东吾,新邵县人,其作品入选《邵阳文库》《芙蓉花开》《芙蓉国》《原上草》等多种选本)



乡村秋韵 郑国华 摄

公民心声

用信仰的力量引领新时代长征

刘运喜

在广西兴安县城北15公里的界首古街旁,坐落着一座名为“红军堂”的砖瓦房,堂前的湘江宽不过百米。就是这样一条不是很宽的江,1934年冬,险些阻断了中国革命的前程。也是因为这条江,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.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。江畔那座红军堂,就是当年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的渡江指挥所之一。岁月无言,江水作证。85年过去,记者再走长征路,在桂北大地追寻湘江战役的遗迹,感受穿越时空的信仰之力。(7月8日《人民日报》)

毛泽东在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》一文中指出:“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,长征是宣言书,长征是宣传队,长征是播种机。”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,中国工农红军进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是震惊世界的伟大壮举。笔者认为,红军长征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,实现战略大转移,除了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正确指挥、红军的英勇善战外,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

因,就是红军战士对共产主义理想的信仰、对革命胜利的坚定信念。正是因为有着崇高而坚定的信仰,红军将士们才能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勇往直前。

信仰是什么?信仰是指对某种政治主张和主义、宗教或某人的信奉敬仰,把他们作为自己行为的准则或榜样。信仰,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内核,也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和脊梁。有什么样的信仰,就有什么样的选择;有什么样的选择,就有什么样的前途命运。

无疑,中国共产党人就是靠对马克思主义、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建立起来的。可以说,没有信仰,就没有中国共产党的诞生;没有信仰,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;没有信仰,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旺发达。

信仰,是共产党人的灵魂,是共产党人的精神之基。信仰的力量,可以穿越时空,可以排除一切艰难险阻,去夺取革命和建设的胜利。

在革命战争年代,中国共产党人的所有奋斗,都为了一个目标,那就是民族独立,人民解放。在和平建设时期,我们所有的奋斗为了什么?为了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,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,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胜利发展,为了共产主义的美好明天。

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,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新时代。新时代,新征程,新目标。“理论上清醒,政治上才能坚定。坚定的理想信念,必须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之上,建立在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之上。”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,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,我们要坚守信仰,坚定信念,增强信心,继承老一辈革命家的英雄传统,忠心为党,忠心为国,忠心为民,发扬“一不怕苦,二不怕死”的长征精神,进行新时代的伟大长征,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。

(作者系邵阳学院教授)